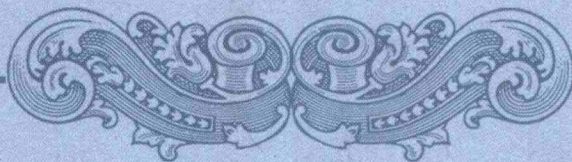


资本新论

(第二版)

CAPITAL
New Perspective



靳共元 著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资本新论 (第二版)

新共元 著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资本新论 / 靳共元著. —2 版.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9. 12
ISBN 978 - 7 - 5095 - 1678 - 2

I. 资… II. 靳… III.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 资本 - 研究 IV. F04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09860 号

责任编辑: 吕小军

责任校对: 杨瑞琦

封面设计: 子 时

版式设计: 兰 波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URL: <http://www.cfeph.cn>

E-mail: cfeph@cfeph.cn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政编码: 100142

发行处电话: 88190406 财经书店电话: 64033436

北京财经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787 × 1092 毫米 16 开 21.25 印张 445 000 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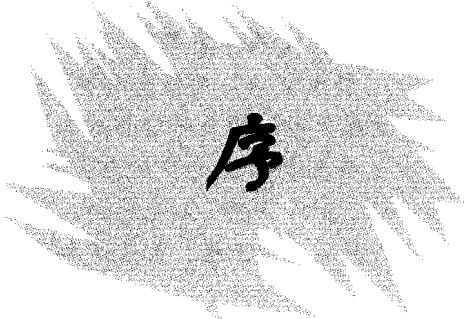
2009 年 12 月第 2 版 2009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 40.00 元

ISBN 978 - 7 - 5095 - 1678 - 2 / F · 145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本社质量投诉电话: 010 - 88190744



序

张问敏*

改革开放 30 年来，我们对“资本”这个重大的基础性范畴经历了抵制批判—争论辨析—合理认识—逐步利用的认知与实践过程，初步形成了在现实条件下大家都能接受的资本和剩余价值的一般性认识。这种认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深层次上制约着改革和开放的规模与速度。

毫无疑问，这是 30 年来理论界最引人注目的事情之一，涉及许多热点与难点问题。改革开放之初的 20 世纪 80 年代，在《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的影响下，对劳动力是否商品的讨论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为社会主义条件下合理使用“资本”范畴营造了初步的氛围。90 年代初，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第一次在党的最高文件中正面使用了“资本”范畴。与此同时，理论界也在探讨社会主义资本范畴的理论依据。老一辈著名的经济学家宋涛、蒋学模、卫兴华等在《经济研究》、《高校理论战线》等各种有影响的报纸杂志上积极阐明自己的看法，还有众多的学者也高度关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资本”和“剩余价值”理论，并努力寻求系统、全面的理解。2000 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资本论》（李炳炎著）；2003 年《当代经济研究》第 4 期刊载简新华、马迪军《论社会主义资本理论的几个难题》；2005 年 12 月 19 日《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刊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杨圣明的《论社会主义的资本问题》，代表了这一讨论的最新成果和水平。在不同的时段，参与这一问题讨论的学者还有何炼成、靳辉明、郭元唏、鲁丛明、陈文通、臧志风、汤为本、许经勇、何伟、闵宗陶、武建奇、潘石、王国刚、韩志国、杨志、廖进球、宋醒民、邱海平等。另外，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资本理论问题的深入探讨也影响了高校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编写工作，1999 年 6 月以张维达为主编，宋冬林、谢地为副主编的《政治经济学》一书，把资本循环、资本周转和社会资本

* 张问敏：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再生产部分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中剥离出来,置入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一般框架之中;2000年7月由程恩富等编写的《政治经济学》也开始在社会主义部分中使用“资本”和“资本市场”的概念和范畴;2002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由吴树青为顾问,逢锦聚等为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材,站在更为前沿的角度,用一般和特殊的方法处理资本范畴并初步阐述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资本运行机制问题,使人们对于资本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客观地说,所有的这些探讨都是有意义的,它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为改革和开放的社会实践提供了积极的理论支持。

在理论界就这一重大问题的艰苦探索中,我要特别提到《资本新论》这本著作。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一位普通理论工作者潜心研究重大问题的积极成果。正是众多这样个体的不懈努力,才汇集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走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道路。这是国家长治久安和社会主义事业成功的有力保证。

透视这本著作,不难发现它的几个引人注目的特点:

一、直面现实生活,主题突出

改革开放使得传统的理论框架发生了巨大变化,就目前所流行的各种政治经济学的版本看,有以所有制为核心范畴的;有以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为出发点的;还有的把社会主义基本规律作为主线等等。而《资本新论》直面实际生活,大胆地直接把“资本”,进一步说是“社会主义资本”当作政治经济学理论框架中的基础性或核心性范畴,这是值得人们注意的。如果说在20世纪的60年代,孙冶方同志曾提出了著名的“价值论”作为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红线,那么改革开放以后的中青年理论家则在继承老一辈学者优良传统和可贵学风的基础上,把卓炯等学者提出的社会主义“本钱论”大大方方地发展为“社会主义资本”的理论体系,这是难能可贵的一次理论创新尝试。毋庸置疑,用“社会主义资本”这一本质范畴来解释当今社会还不能不存在的“利润”、“利息”、“地租”以及“房地产市场”、“股指期货”和“典当租赁”等经济现象,具有极强的说服力,有利于我们从根本上突破“资本主义”能干不能说的理论窘境。

二、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

近年来理论界有两种风气值得人们注意。一是教条主义的风气。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格式化、教条化,继续对“资本”抱着敌视、憎恨、批判的态度。二是全盘西化的风气。一些人有意无意地淡化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指导作用,不顾中国的国情照搬照抄西方学者教条。面对这两种风气,《资本新论》试图走出自己的路子:既刷新社会主义对“资本”的认识,又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资本新论》中,作者强调马克思所创立的劳动二重性学说的伟大意义,坚持剩余价值理论的普遍意义,为我们在社会主义特殊的历史阶段,科学正确地解释财富源泉和最后实现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作出了系统的理论说明,从而和一切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理论划清了原则界限。同时,作者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又大力发掘了

马克思“系统辩证论”的思想，为我们在现阶段合理利用曾经被严厉批判的“资本”范畴，找出最重要的哲学方法论上的依据。“系统辩证论”不是对以往我们熟知的唯物辩证法的否定，而是唯物辩证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必然表现，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最具有活力的一种宝贵财富。把这些财富发掘出来并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正是高举和弘扬了马克思主义的旗帜。“社会主义资本”范畴及其理论体系的形成，是改革开放时期运用系统辩证论的必然结果。

三、追寻理论争论的轨迹，脉络清晰

长期以来中国人对“资本”这一范畴有着一种特殊的敏感神经。“姓资姓社”的讨论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和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让“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成为流行神州大地的经典口号。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让中国人民重新审视以往的各种观念。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以后，人们开始讨论劳动力商品问题，触及了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关键环节，但“资本”禁区还未能打破。一直到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后，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本”范畴的研究才开始步入正轨。《资本新论》一书对这个过程的描述是真实而可信的，对一些重要事件的概括和所给出的结论也是准确的。历史是一面镜子。回顾历史，我们才能明道理知是非，反思历史，我们才能大踏步前进。相信读了这段理论性很强的历史描述后，每个人都会引起同感。

上述三个特点既体现了理论工作的本质要求，也是作者人生品格的一种自然反映。我和作者于1995年10月结识在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召开的“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上，那次会议安排去曲阜参观孔府，晚上休息我们碰巧安排住在一起，聊了许多。在聊天的过程中，无意之中谈到了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个故事。当时正在筹备孙冶方基金会。有一个青年看到报刊上对孙冶方事迹的介绍后，深受孙冶方追求真理精神的影响，决心以孙冶方为楷模塑造自己的人格。他便寄去50元人民币（相当于自己当时一个月的工资）作为孙冶方基金会的基金，以表对孙冶方的景仰。但由于孙冶方基金会不接受私人捐款因此把捐款退回。这件事，曾经在小范围内传播和议论。没想到，那个青年竟是在我眼前的靳共元。于是便对他刮目相看，并成了朋友。

他是“文革”后第一批入学的研究生，有不少独立的见解。如《“真理有无阶级性”命题能成立吗？》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提问，《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应该是商品》为“社会主义资本”的破题奠定了一个理论基础，后来又发表了《“社会主义资本”断想》、《走出资本的误区》、《论资金、资产和资本概念的区别和使用》，尤其是1994年他和冯子标一起署名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论“社会主义资本”》，逐渐形成了“资本新论”的理论基础。2003年《资本新论》出版。在这部著作中，他试图回答如何真正科学地在经济、社会以及政治等层面上，全面审视这个影响了几代

人的“资本”范畴？如何从方法论的角度处理好一般范畴和特殊范畴之间的关系？如何从历史的角度反省和正确把握一些和资本相关的敏感问题？如何使这种基础性的研究更加有效地为改革开放的社会实践服务？这些都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重大理论问题。《资本新论》对这些问题的全面阐述应该说是一个宝贵的尝试。它顺理成章地推演出带有时代特点的“社会主义资本”范畴。其重大意义在于，为我国各类企业的平等竞争和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寻求深层的理论支持；为各个阶层的积极努力和各种社会群体的和谐共进提供恰当的解释依据；为落实科学发展观，建立节约型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一种带有根本性的理论和方法上的指导。

2007年12月《资本新论》获得山西省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出版社又决定再版《资本新论》，说明社会对《资本新论》的肯定。对此我也衷心祝贺作者取得了优异成果。

当然，《资本新论》中的许多论述还不够完善，很多重要的讨论仅仅只是开头，还有大量的后续工作要做。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基础性范畴的研究工作不仅重要更是一件吃苦的事情。说它重要是因为它不仅是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需要，更是深入回答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不能缺少的重要环节。说它吃苦是因为在当前物欲横流的背景下，抵御诱惑、甘坐冷板凳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然而正是在一种高尚的、艰苦的研究与探索过程中，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别是中青年理论家会逐渐成长起来。

《资本新论》体现着作者多年的努力。第二版又增加了一些同行的评论和最新研究成果。希望更多的人关注这本著作，并讨论其中涉及的重大观点。只有理论界的共同努力，才能真正有效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的创新，努力使它变为对党和人民事业有利的思想库，从而确保中国改革与开放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2008年11月30日 于北京

资本

——不了的情结

(代第二版自序)

资本，这是一个极其严肃的论题。但我却想从我所经历过的事情谈起，也许这会使得论题变得轻松一些并且不至于使人感到枯燥……

—

1961年，我8岁，是刚懂事的年代，满脑袋就装了一个“吃”。不是要吃好，是要吃饱。每次吃窝窝头的时候，总是要用两个手把它掏起来，生怕掉下渣来，浪费了粮食。其实那个时候人们蒸的窝窝头就是粗糙的玉米面和水简单混合物，根本是无渣可掉的。饥饿太可怕了！我知道爸爸每个星期天都要骑自行车到几十里以外的野地里去挖野菜，是为了让大家都平安地渡过难关，但最后还是没能挽留住我的一个只有两岁半的小妹妹的生命。她太贪吃了！那年当我们回农村老家过暑假时，我的大伯用他们从来都不舍得吃的油饼招待我们，小妹妹太高兴了，趁大家都顾不上注意她的时候，拼命往饥饿的肚子里塞，回到城里后，就开始发烧很快引起肺炎。当时爸爸是一个会议上的工作人员，连续11天没有回家。等他回来时，小妹妹已经没有救了。此后，我们兄妹和母亲随着压缩城市人口大军回到农村，成为碾麦场上排队等候分配粮食的社员，但粮食还是不够吃。油饼或者麻花依然是极端的奢侈品，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品尝一点。饥饿，这是我小时候对外部世界的全部印象，人们生来似乎就是为填饱肚子而挣扎的。我不知道也没想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儿。

二

1971年，我在农村劳动。那年，我18岁，正处于如饥似渴寻求知识的年龄段。林彪“九·一三”事件的发生，带来了一个“三要三不要”的学习热潮。这第一个就是“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我拿起当时印发的宣传小册子，读过来，读过去，感到既新鲜又不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辩证唯物主义？什么是

历史唯物主义？宣传材料太简短，不能满足我的要求。所幸找到几本《联共（布）党史》、《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之类的书，算是帮了大忙。回想那时候一边浇地，一边看书思索，倒也真如仙境一般。可惜此类好事并不常有。更多的是繁重的体力劳动在等待着我和与我年龄相仿的年轻人。在漫长的砂石路上我拉着板车上坡，汗水拌着难以支持的心脏搏动不断地洒落在长长的望不到头的车辙里，在为生存而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打井淘水中，我知道了什么叫冰凉、森严和恐怖。原始的从下种到收割的劳动方式耗去了人们无数的梦想和希望，也曾使我悲观之极。我羡慕城里人的生活。我的最大愿望是进城里到新华书店当一个卖书的或者到小学里当一个教员，因为两者都可以让人有时间看书。很遗憾，我没有条件也没有人帮我完成这一宏愿。我只能老老实实、认认真真地在地里干活。不管怎么说，我从来没有意识到我们现实的体制是需要改变的，更意识不到我们的意识本身是需要改变的。我对批判资本主义、批判集市贸易打心底里是拥护的，认为要时时刻刻警惕资本主义复辟，以防“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1973年，我进了一所大学读书。不管别人怎么做，我是很对得起这几年的学习生活的。这个时候的大学图书馆还没有从“封资修”的大帽子底下解放出来。“文革”前的书籍、杂志和报纸基本不开放，人们能阅读的除了“两报一刊”外，剩下的也就只有“学习与批判”一类的“极左”刊物。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不知为什么，当时觉得这个“极左”杂志上的文章写得还是很好的。当然，我不能只看这些文章。我还应设法看更多的书。这期间，在农村养成的劳动习惯帮助了我。由于我总是帮助图书馆的管理人员打扫卫生，他们破例允许我看“文革”以前的各种杂志和报刊，使我眼界大开，对工厂、农村的生活以及各种政治运动如何在刊物上、在理论上得到反映，心里逐渐有了一些看法。3年的学习结束后，我回到原籍一个县城里工作。两年后，也就是1978年我参加研究生入学考试，并有幸被录取。

三

重返学校3年的研究生读书生活对我从事理论工作影响极大。这是一个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年代。每一个立志于中华民族复兴的人都不会忘记那个非常特殊的时代。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刘少奇等一大批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平反昭雪……几乎每一天都有令人震惊或振奋的消息。它在急速地催促我改变已经在朦胧中形成的对社会和政治理论的看法。我写了一篇“‘真理有无阶级性’这个命题能成立吗？”的争论文章，发表在《国内哲学动态》1980年第4期上，提出要从认识方法的角度结束这场旷日持久的讨论，得到了同行的支持；我还写了一篇《道德规范要适应经济基础》的短文刊登在1980年8月13号的《文汇报》上，批评“文革”时流行的“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国家和集体的事再小也是大事”的观点，提出新一代不再愿意购买进天国的“赎罪券”。我认为那个时候的报纸杂志是非常负责的，不仅没有现在普遍存在的“有偿稿件”现象，而且在刊登文章

前还要和作者单位核实本人情况后，才发排稿件。我没有能力写大块一点的文章，也没有人愿意登我的长一点的文章，所以只能就感兴趣的问题不断地谈自己的点滴看法。

但我相信这些点滴看法是经过反复思索才提出的。无论对与不对，我都对它负责，并且一再坚持到底。1981年，3年的研究生学习生活结束，我留校任教，这使我有机会继续读书学习。我认为这是天下最好的职业，因为它有相对多的自由、时间和空间，去探究未知世界和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尽管社会上对“教书匠”的地位并不是太看得起。

四

在大学里，我担任了很长时间的《资本论》及《政治经济学》的授课工作。除了学习、教书外，我断断续续地兼做过其他许多事情，包括班主任、学生党支部书记、系主任、学院院长的工作。这对增加社会阅历，提高对各种理论问题的认识是有好处的。我还积极去工厂、农村参与各种课题的调查研究活动，不断地了解改革的新实践。1989~1990年我去北京大学学习“西方经济学”，使我能够换一个角度去看待我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1998~1999年去美国匹兹堡大学作访问学者；2007年访问了德国和欧洲的一些大学并参观了马克思的出生地特里尔城。这使我亲身经历了我已早在理念上认识到了的资本主义现实。各个不同角度的学习，给了我一次又一次的思索问题的机会。我把它逐渐记录下来，成为整个国家和社会转轨的一个特殊层面上的缩影。

五

这个记录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对“资本”问题的思索。

这曾经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重大问题。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们宣布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资本”范畴就成为党的政策文件和人们日常生活中最为忌讳的东西。别说正面肯定这一范畴，就是提上一点和它相近的概念，也会遭来非议甚至祸及人身。实践上的“三自一包”或“小商小贩”给多少人带来批斗，我们无从仔细统计，但有一点是不容怀疑的：它造成的威慑“资本主义”的心理态势，是许多年都难以抹平的。60年代孙冶方的“利润论”、卓炯的“商品论”、李平心的“生产力二重性论”，均遭到毁灭性的批判。70年代的小说“金光大道”中的高大泉和电影“青松岭”中的钱广，更是从正反面对立的艺术形象上反映出那个时代狠批“资本主义”的战斗精神。80年代，人们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战略思想的引导下，小心翼翼地在“按劳分配”、“劳动力商品”等问题上展开探讨。所幸，这一次，没有出现大的反复，最后，终于在90年代初大规模地接近了“资本”这一本质性的范畴，并且终于取得了巨大的理论成果。在消灭“资本”近半个世纪后，我们才又重提久违了的“资本”，心中别有一点难言的隐痛。

六

这个敏感问题曾让我有许多个夜晚难以入眠。当我发现小时候令人们饥饿难熬、苦痛非常的原因竟和我现在从事的论题相关时，心情是非常复杂的。当我漫步在已经高度发展的异国他乡的林间小路并为中华民族在近代落伍深感痛惜时，更加坚定了我的信念和我的追求。从小就下决心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而奋斗。对于这一信念，从总体上说我现在也没有后悔过。但具体到历史的特定层面反思的时候，理念的矛盾和碰撞带给人的痛苦是很大的。我们从小就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的氛围下长大的，怎么能轻易让它在社会主义的阵地上立足？不要说文革中的残酷斗争使人不寒而栗，就是一顶“右派”的帽子也足以把人压趴下的。改革过程中的风风雨雨、反反复复，是每一个人都能看到的。敢不敢正面肯定“资本”范畴，能不能大大方方、顺理成章地把它请到我们这个社会里来，这不仅需要逻辑和概念推导的思维能力，更需要做人 and 做一个为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献身的理论工作者所不可缺少的勇气。我的能力不够，但我愿意努力；我的勇气不足，需要更多的人来鼓励和支持。

七

第一个支持我的人是在相养谋教授。这位 20 世纪 50 年代就从事理论教学的老先生是我上大学和上研究生时期的导师之一。我最初关于按劳分配的稿件就是经他编审并推荐发表的。80 年代末，我把关于“社会主义资本断想”的初稿交给他的时候，他告诉我：“断想不错，要想下去。”经他建议并帮助修改，我把其中的一部分摘要发表在《山西大学学报》等刊物上。

山西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的郑玉光研究员是第二个重要的支持者。这位有突出贡献的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当时是学会部的负责人，对包括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的各种研究活动给予极大的支持和帮助。当 20 世纪 90 年代初，我把以“资本”理论为重要内容的“社会主义企业财产实质”的研究结果交给学会部时，他郑重地和其他领导研究决定给以精神和物质上的奖励。在社会科学经费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学会部为研究者争取到一部分必要的研究经费，不仅解决了一时的纸张和打印方面的困难，更重要的是维系了研究者的精神支持。在“八九政治风波”后，为了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他又果断地主张山西省《资本论》研究会升格为一级学会，从而更方便地开展各项工作。社科联的杂志也积极主动地提供版面，帮助研究者宣传扩大自己的研究成果。有关“资本”的研究论文或著作已获得省部级多项奖励，为更多的人所认可并接受，没有他们的支持，这一切都是无从谈起的。

八

在我研究这一问题的努力中，山西财经大学原校长冯子标教授也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指导者和合作者。这位在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年代参加中央党校著名的《实

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的讨论，并且以带头批评“大寨经验”、带头鼓励“集市贸易”而在理论界享有很高声誉的经济学家，对“资本”问题也早有注意。20世纪80年代末，他在《经济改革与理论思维》等著作和论文中提出国有企业的“产业资本”的性质；在他所承担的国家教委“八五”社科课题“市场经济与企业制度创新”的研究中，注意到社会主义企业资本的运作机制等问题。当我和他谈及“社会主义资本”这一深层次的论题时，许多方面不谋而合，令自己感到吃惊。我羡慕和钦佩他的深邃的思想，敏捷的才思，大家的风度和长者的宽厚，他尊重我正直的人格、不屈的精神和勤恳敬业的品性。我们在一起，就“资本”问题不断地交换意见。不仅如此，他还与我商定，为中华民族的崛起，为党的理论事业发扬光大，要组织起一支学术队伍，把社会主义资本这一重大理论问题深究到底。实践证明，我们的决策是正确的。10多年来，这支队伍硕果累累，已经出版和发表了一批质量较高、影响较大的学术著作和学术论文。先后承办中国《资本论》研究会第十届学术年会，全国高等财经院校《资本论》研究会第22次学术年会、全国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暨经济学院院长联席会和孙冶方基金会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理论研讨会。2006年我们终于成功申请到政治经济学博士授权点，为更好地进行理论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九

《资本新论》应该看作一个集体研究讨论的成果，有许多热心理论的人都在关注其涉及的论题。山西师范大学的周扬明教授、太原师范学院的原玉廷教授、山西大学的武高寿教授、梅建军副教授等学者，还有我的研究生杨振东、丁立芬、韩朝辉等是我们这个集体中最活跃的积极分子。事实上这部著作也不仅是我们这个研究群体的劳动结晶，而且应该被看成是全国经济界、理论界同行共同探讨的结果。在长期的探索中，我们感觉到：关心、关注或者直接参与这一论题争辩的专家、学者、教授、普通教师和学生乃至工人、农民是很多的。在《政治经济学》的课堂上，以此论题为主的讨论，始终是受学生欢迎的，它打破了这门课程呆板、沉闷、毫无生气的旧有局面；在国有工商企业的调查中，每一个这样的话题，都会引起大家的共鸣；在私有业主方面，引起的反响就更为强烈了；即使在直接从事生产劳动的工人、农民中，赞同引进“社会主义资本”概念或范畴的人也越来越多。他们都对这个论题发表了极为中肯、极为透彻的看法。我们始终认为：必须有更多的经济学者、理论专家以及普通百姓投入到这一讨论中，来一次全民的思想大解放，才能真正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繁荣昌盛。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著作是由全社会关心进步、发展的人们共同写成的。

十

这部著作论及的主题和我们对历史的反思直接有关。共和国走过60年的路程。它是辉煌灿烂的，也是艰难曲折的。喜悦伴随着泪水，胜利带来更多的沉思。1978年后的30年和以前30年的经济发展和百姓生活是有质的差别的。曾几何时，我们连

肚子也填不饱,严格的粮票、布票、油票、糖票,以及形形色色的火柴证、棉线证、豆腐证还有稍后出现的购物券、外汇券等等,那是物资匮乏极端无奈的表现。而如今,我们用了短短的20年时间,便把物质财富魔力般地呼唤出来。人们穿的衣服漂亮了,吃的东西丰富了,住房变得宽敞了,行路大大方便了。几十年前想也没想过的超级市场,一夜间涌现出来,电子邮件、网络通话和3G瞬间变得不仅时髦而且实用,自行车王国开始向汽车王国发展,地上行路方式开始往天上转移。整个社会的经济状况开始了根本性的转变。何以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这里原因是多方面的。技术方面的原因当然是有的,我们不排除现代技术革命对我们这个社会产生的巨大影响,但人们并不难发现,革命并不是刚刚发生的。如果从经济的角度看,我们不难发现这里最重要的原因是没能对资本、资本家、资本的生产方式等等这些和现代社会紧密相连的东西给以科学的分析,并赋予它们应有的地位。我们凭一时的激动、美好的愿望,想去建立一个理想的空中楼阁,这是不能不让人感到遗憾的。如果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于夺取政权的需要,我们无法使资本作为生产力很好地发挥建设的作用,这是可以理解的。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开始“一化三改”后,我们由于各种政治上的原因,把“资本”从根本上加以否定,彻底取消了它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这造成了多年来生产萎缩和人民生活的巨大困难,这是需要反思的。正是改革开放年代一次又一次的反思,我们重新认识了“资本”,并使“资本”进一步焕发出活力,整个经济面貌才得以改观。

十一

我敢肯定,直到今天社会对“资本”的看法都还是一个极为紧迫的问题。上至国家宏观管理部门,下到微观企业运行,能不能按照资本,进一步说是能不能按照“社会主义资本”的规律去办事,仍然值得高度重视。我们不否认改革和资本运作已经给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人民的生活水平由此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但事情远未结束,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仍然任重道远。有些方面需要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我们每个人都不难发现:中国的国有企业大而又大,但效益好的,名声大的,有竞争力的也是屈指可数,这是因为相当多的国有企业还不能真正步入资本运行的轨道。从“拨改贷”到“利改税”,从“利改税”又到“企业资本金”制度再到今天的“债转股”,这期间要求变换的并不仅仅是金钱和财富的流向。

国有经济拥有整个经济50%的资本存量 and 人力资源、70%以上的银行贷款,但提供的产值、新增的就业并不能让人满意。宝贵的资源并没有进入高效的运作体系,扭曲的和资本无缘的工厂企业制度已经让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为其效益担心。一些国企领导对自己的企业表示“无法负责、无权负责、无心负责、无力负责”。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的问题,经常以不同的方式干扰着企业资本运行的正常机制。前几年的国务院稽查特派员的调查显示,100%的国有企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20%的有严

重问题。没有资本全方位的到位与发挥作用，整个国有经济就不可能真正搞活。

就民营企业来说，问题则从另一个方面表现出来。各种行政部门以及许多管理体制上，由于不承认“资本”范畴和资本运行的规律，为生产的正常发展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障碍。据国家体改办的一项调查显示，某地区 80 多个行业中，国有经济已经进入的有 70 多个，外资进入的有 60 多个，而非国有经济进入的只有 41 个，有不少竞争性行业至今仍不准非国有企业进入。不平等的经济格局，不仅影响经济发展的速度，而且直接给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不便。

前几年，北京的公共交通状况不够理想，很多车车况不好，上下班高峰时期非常拥挤，等车时间长，线路安排也不合理。因此有私人老板想来投资加以改善，得到的答复是北京还没有取消民间投资的禁区。于是公交状况长期得不到改善。各地与资本发展和市场经济要求不相适应的做法屡屡出现，民航系统反复多次的“禁折令”，铁路系统目前仍然生硬地存在的“不涨价”的做法，还有某些城市的形形色色“限房价”、“限地价”乃至“限一碗牛肉面价格”的荒唐做法层出不穷。在应对 2008 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的数万亿国家增加投资中，私人企业和民营经济并没有得到和国有企业一样的待遇。

“资本”——在现代社会中，这是经济发展的主题和主体。无论是对宏观还是对微观，也无论是对国企还是对私企，它都在显示着无比的重要性。

十二

我们再来把“资本”演化到活生生的人当中。

中国的劳动力多而又多，但中国的“老板”，也就是说“资本家”相对说少而又少，这是造成城乡就业率过低和下岗工人无法安置的最直接的原因。在现代社会里，再也没有比找不到工作这样的事更烦心的了！但只有更多的“老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劳动者急于找到工作的问题。但“老板”能多起来吗？除了极少数特殊领域外，中国人有钱后，愿做“老板”、能做“老板”、会做“老板”吗？

不愿做，是因为不做比作活得更舒服、更潇洒，“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千里做官，为吃为穿”，概括了从古至今无数的中国人的信念和追求，它一旦泛滥成为一种民族精神，这个民族就像吞食鸦片上瘾的人一样，难以救药。“十亿人民九亿麻”，是说当今人们打麻将成风，不思进取，长此以往，怎能有民富国强的未来？不愿做“老板”，但是愿意进衙门，搞特权，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悲哀。不能做，是因为做“老板”后，今天这个部门收税，明天那个部门收费，税费过后，所剩无几，白白辛苦一场。有时说不定还得倒贴一笔。至于求人办事小三辈，好话说尽无人理，平白无故遭罚款等等之类的事，更是冷淡了做“老板”的热情！不会做，是因为缺乏教育、缺乏信息、缺乏管理、缺乏人才。从国有企业著名厂长储时健到私营企业大王牟其中再到土皇帝禹作敏，他们都是只认识“财富”，不认识“资本”；只是当“财主”，不去当现代意义上的“资本家”；只知道从原始的“私有”观念出发，用“家族式”

的管理方式，一味地为自己攫取财富，不知道私到尽头必姓公，现代化管理的企业必然要战胜陈旧的生产方式。

一句话，普及资本观念，宣传资本的生产方式，战胜落后、战胜愚昧、战胜腐败、战胜自我，是中华民族发展到今天任何人都不能避免的一种挑战。我们的全部理论探讨都是围绕着这一主题展开的。

十三

理论探讨有自己特殊的语言。尽管，大众化应该成为每一个理论工作者份内的要求，但我们还是无法彻底离开专业术语和约定俗成的规则。因此，阅读或撰写理论文章也许不能成为读小说一般的消遣。只有愿意思索的人才能建立起益友良师的关系。这不是在给理论工作者找自我高贵的理由，而是说我们的民族应该从整体上提高素养，习惯理论思维，从而会更理性地从事社会工作和经济建设。不仅如此，而且我们还要提到，理论的每个领域都有相对狭小的范围限制。在这个意义上，对现实生活的任何理论表述都无法完全满足活生生的实践需要。我们尽量用准确的逻辑语言去表现我们的看法，但常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们知道“资本”这一人类历史一定阶段的产物，其发生作用的范围绝不仅限于生产和流通的领域，它事实上将对我们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传统习惯等各个方面发生全方位的影响。我们现在所涉及的只是在理论思维方面的一部分，而且，大部分还仅限于批评传统观念和正面阐述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观点上。

要把社会主义中的资本现象用理论彻底解释清楚并提出符合当前社会实践的理论观点和行动措施，要做的工作实在是太多了。在我们这样一个天生就似乎和“资本”萌芽不能相容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中，从“资本”观念的确立到“资本经营”的运作，一切都是从头做起的。令人感到欣慰的是，从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正式使用“资本”概念，到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及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等重要文献中，大量使用“资本营运”、“资本市场”、“以资本为纽带”等这一类的说法，已为我们未来的全新概念和范畴提供了广阔的生产和社会活动的空间。

十四

理论探讨有自己的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追求真理、追求进步应当成为每一个理论工作者行为的准则。遗憾的是并不是人人都能做到这一点。随波逐流，人云亦云，墙头草，随风倒，满脑子功利主义，更有甚者心怀邪念，别有用心，把理论变成敲门砖，这些都与知识分子的独立思维的天性相悖，更与理论工作者的神圣使命不配。“跟风”一旦形成气候，对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造成的危害是致命的。几乎毁灭了我们整个国家的十年“文革”，是和“跟风”这种极恶劣的气候直接相关

的。国有企业的“保值”和“增殖”一夜间，变成了“保值增值”这种固定的说法，但没有多少人愿意为此作出更多的解释。

社会主义资本问题的讨论，不是“跟风”的结果。它是理论工作者用自己的思维、自己的智慧、自己的主张影响党和国家最高决策的一个成功的范例。于瑞厚、王东胜、张矛、李为民等等这些名不见经传的普通的人，早在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很多年以前就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提出了资本的共性和它在社会主义发挥作用的问题。我们和他们一样也是无数个经历过这样思索的人之一。《中国社会科学》上“论‘社会主义资本’”一文，发表在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正式使用“资本”概念的半年之后，对《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起了较为广泛的宣传作用，而这样的理论思索，实际上早在很多年前就开始了。它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更不是作“第二宣传部”，它符合中央文献精神，完全是因为现在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实事求是的精神与理论工作者的多年的努力思索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的一致。

十五

在本书中我们把这个理论思索的过程，基本上按照时间顺序排列起来。这样做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可以把我们自己的弱点和缺点一览无余地暴露在读者面前，以利更多的人少走弯路，多出成果。在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党和国家经历了巨大的曲折和反复，为数众多的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为此付出了代价。我们是循着前人摸索的道路继续行进的。在深刻而广泛的探讨过程中，任何个人的奋斗也许都是微不足道的。我们愿解剖自己探索的过程，这是出于对历史的负责。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讨论和研究实际上最先从按劳分配上找到突破口的。80年代初的数次全国性的按劳分配理论讨论会伴随着《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出台，而最终巩固了自己的胜利成果——那就是从按劳分配引发出来的等价交换的商品经济原则这一曾被看做是资产阶级特有的法权（或权利），终于被提到社会主义的高度，人们确立了“社会主义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样前所未有的论断。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一些自50年代就视商品经济为“洪水猛兽”的人和坚持正面引进商品经济的人之间长久的理论上的对立深化了。1986年当国务院关于“劳动用工的四个暂行规定”颁布后，剧烈的“劳动力商品争论”在短期内爆发出来。当时，就有人预言，从“商品论”退到“劳动力商品论”必然导致进一步退到“资本论”，到那时，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石就一块一块地被搬掉了。我没有记住是哪位理论家讲的这句话，但当时至少我是坚持“劳动力商品化并不会导致资本主义化”的。从主观的角度上说，我还不能从习惯的思维上认可“资本”概念，从客观上说，整个社会包括我自己的工作都还没有更深入到社会的这一层面上。不管当时是出于什么样的想法，现在看来，这样的观点至少是不彻底的。我还提出个体经济雇工不会导致剥削，论证方式今天看来也有不当之处。

20世纪80年代末，我们的想法就已经彻底转变了。“劳动力商品”论只能为解

决劳资问题提一些建议,但国家和社会的更加根本和突出的问题是资源浪费、经济秩序混乱、管理错位。如果说,劳动力的积极性可以通过劳动力商品化来解决,那么对国家和社会特别是经济生活方面的带有根本性的重大问题只有通过更加根本、更加本质的范畴来解决。“资本”的呼声,顺势而出。大约3万字的《“社会主义资本”断想》就是这个时候萌发出来的。现在回头看,总的精神是应该肯定的,但许多看法已被实践证明我自身的小农意识还是很浓的。例如,我一直感觉人们的消费水平提高过快,认为这种状况对发展生产、建设国家不利,甚至把农村的建房热也看作是一种过度消费的倾向,这种看法今天看来肯定是不准确的。这也许是受小时候极端赤贫生活状况的影响,不敢对任何本应属于正当人的正常需要抱有奢望。对一个一年只能分到200斤粮食和半斤食用油的农民来说,五间宽敞明亮的大瓦房的确是一生的梦想,更别说是两层的小洋楼了。我们只是在理念上认识和谈论了“资本”,但远没有实实在在地感受“资本”。在实践上“资本”呼唤出来的生产力的确让我吓了一跳。饭店里吃饭的人不再排队抢座位,街上的公交车里突然间由于大批小巴涌入而变得宽松,“超级市场”在一夜间冒了出来。人们确实由于事实上的资本机制运作而带来了收入和消费水平上的提高,而较高的消费水平又刺激了资本的生产力,良性循环由此而起。和西方国家的居民相比,中国人的消费水平仍属偏低,大多数人精打细算,量入为出,不肯过多地消费。在产品经济下崇尚的美德,到了商品经济、资本经济下,未必有利于经济的发展。改变全民族的消费意识和消费观念,也许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是进入新世纪之后的检讨,已和十几年前的想法大有区别。

当然,在充分肯定资本作用的同时,我们时刻不能忘记它的历史局限性,当前的金融危机乃至可能引发的经济危机,反映着这种生产方式与生俱来的缺陷。用“社会主义”加以制约,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但客观地说,这些问题在长期处于短缺经济的背景下,是无法显现出来,更无法得到合理的解决。但在以资本为基础性范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正视并恰当处理这些复杂问题不仅是题中应有之义,而且是保证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成功的必然之举。

十六

需要再认真地强调一次,上述问题的讨论绝不是可有可无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是发展,我们越应该注重精神文明的建设。随着人们物质生活的日益改善,人们精神活动的空间不断扩大,要求也会越来越高。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这个国家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它作为真理、指南和方向,指引着饱受苦难的中国人民一步一步走向繁荣和富强。作为人类精神文明宝库中的重要财富,马克思的学说,即使在已经处于发达阶段国家中也是有一席之地的。被西方媒体和舆论界誉为“千年思想家”的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分析的确是极其丰富和伟大的。把一切失误和缺点归罪于我们已经形成和确立的信仰,只能说明一些人的浅薄无知和狂妄偏见。当然问题还不仅只在于此,活生生的、有说服力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已比任何